

也谈柏林本《列国志传》

氏冈真士

关键词:余邵鱼/余象斗/梅园/四知馆/杨美生

《列国志传》据说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余邵鱼编纂的一部历史小说，内容从武王伐纣谈起，描写到始皇一统。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根据这本书，砍掉了西周部分，重新撰写《新列国志》。清乾隆年间（1736–1795）蔡元放又把《新列国志》略加修改而写成《东周列国志》。可见《列国志传》对后代影响很大。

我在这里要谈《列国志传》的版本，是德国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珍藏的一种。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先生曾经介绍过这本书，我只不过是打算作些补充，希望为了加深这方面研究能够做点贡献。

一、研究小史

关于《列国志传》，不少专家进行过研究。孙楷第先生应该说是奠基人，他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里说：“此书万历前本未见。今所见万历本有二本。一为八卷本名《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一为十二卷本名《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据孙先生说，八卷本主要有两种，即内府钞本和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余象斗重刊本，另有几种李卓吾评点本。余象斗把余邵鱼叫做“先族叔翁”。十二卷本也有两种，都是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陈继儒重校本，一个有朱熹序，另一个却没有朱序。孙先生推断有朱序的那本是重刊本。还有坊刊十六卷本、十九卷本，叫做《新刻史纲总会列国志传》。

孙先生也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里推断余象斗重刊本出现在陈继儒重校本之前，并指出：“书中每引潜渊居士读史诗，及皇明东屏居士诗”。介绍《封神演义》的时候，孙先生又指出它和《列国志传》的共同底本是《武王伐纣平话》。孙先生还有〈跋陈眉公先生批评列国志传〉（《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指出《列国志传》可能是根据平话、杂剧编纂的。

周贻白先生在〈《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里用《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十六卷本探讨《列国志传》的源流，试图弄清其与《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以及《有商传》等书之间的关系。《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郑振铎先生曾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里介绍过，该书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是嘉庆年间（1796–1820）刊本，虽然称为“蔡元放批”，但是有陈继儒序，故事从武王伐纣开始。郑先生怀疑“新增”

是假话，整个内容出在《封神演义》之前。

周先生手里也有《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十六卷本，又题为《新刻史纲总会列国志传》，是同治年间（1862-1874）刊本。他推断该书其实出于余邵鱼的旧本《列国志传》，要不然该书不会插入余邵鱼、东屏先生和潜渊居士的诗。周先生指出这本书的“卷四”“卷五”“卷十五”各有两卷，比如“卷四”“又卷四”，因此实际上是十九卷本。他又指出《列国志传》也是《封神演义》的底本，而且它们都是《有商传》的底本。

刘修业女士在《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里重新介绍巴黎本《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时，推断是出于余象斗刻本。她也重视书内所引的诗词，并指出卷一至卷十四有余邵鱼、余仰止、东屏、潜渊等人的诗，卷十五和卷十六却没有，相反，周静轩和丽泉等人的诗仅仅出现在卷十五和卷十六。刘女士又指出《列国志传》是根据《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等平话和《说专诸伍员吹箫》、《鲁大夫秋胡戏妻》等戏曲而编纂的，它的内容和所引的诗词之间也有关系，在武王伐纣到孙庞斗智的部分载着不少东屏和潜渊两个人的诗，乐毅图齐以后则静轩诗和丽泉诗多。

英国博物院图书馆也收藏着“梅园梓行”的《列国志传》，刘女士说：“不分卷”。可是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录（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龙门书局1967年版）里指出是八卷本，并刊登了两张书影，即封面和卷一第一叶a面。该书有陈继儒序，封面题《全像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目录题《新刻史纲总会列国志传》，本文首叶题《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柳先生又把这个梅园刊本跟十二卷本进行比较，推断前者比较接近于原本。柳先生还在〈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明刊本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之关系〉（《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里逐一证明《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卷一、《封神演义》以及《有商志传》等书之间有承袭关系。

大塚秀高先生在〈讲史章回小说的出版与改变 - 以《列国志》为中心 - (讲史章回小説の出版と改变 - 『列国志』をめぐつて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3号，1989年）里分析明代南京、福建、苏州等各地的出版社怎样展开竞争，以及《列国志传》《新列国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大塚先生的论点涉及多方面，就万历本《列国志传》来说，主在弄清各种版本的收藏情况，并详细地介绍每种版本之特点，最后指出十二卷本当中没有朱篁序的其实晚于有朱篁序的那种，不仅如此，后者还比余象斗重刊的八卷本更接近于原本。大塚先生在〈三续研究前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4号，1998年）里亦讨论有关《列国志传》版本的问题。

小松谦先生在《中国历史小说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版）里指出《列国志传》有四个脱离历史的地方，即武王伐纣、临潼斗宝、孙庞斗智以及乐毅图齐。小松先生探讨其来历，把重点放在临潼斗宝、乐毅图齐故事上。他推断《列国志传》是以平话和戏曲故事以及民间传说为基础，用通俗史书加以补充的。他又指出《列国志传》当中“有诗为证”这一套句的分布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和《列国志传》各个部分如何受到民间文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曾良先生在《〈东周列国志〉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版）里梳理《东周列国志》的史料来源，探讨有关这部小说的种种问题。就《列国志传》来说，企图弄清其与全相平话以及《孙庞演义》的关系，并分析了《列国志传》的仁政思想和艺术得失，最后指出它有模仿《三国演义》的地方。

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先生在〈列国志传 - 对德国如何接受一部中国长篇小说的

看法 (>Die Geschichte der verschiedenen Reiche 列国志传<. Anmerkungen zur Rezeption eines chinesischen Romans in Deutschland. Aus dem Antiquariat. 1-1999) <) 里分析德国收藏的三种比较古老的《列国志传》和英国收藏的梅园刊本之间的关系，并介绍德国专家阿仁特 (Carl Arendt, 1838-1902) 从《东周列国志》译出来的《幽王宠褒姒 (Das schöne Mädchen von Pao)》对后代的影响以及德国收藏的满文《列国志》之意义所在。

下面我想集中谈一下德国收藏的《列国志传》诸问题。

二、德国收藏的三种《列国志传》

德国有很多珍贵的中国古籍，福克斯 (Walter Fuchs) 先生曾经在《汉满抄本与稀见刻本 (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Wiesbaden 1966)》里详细地介绍过。据该目录记载，德国有两种《列国志传》，一个在魏玛 (Weimar)，一个在沃尔芬彼特尔 (Wolfenbüttel)，这两种都是残本。魏玛本保存着《叙列国传》的一部分和卷四第二叶至第十三叶，沃尔芬彼特尔本则有卷二第二叶至第六十四叶、卷三第二叶至第六十九叶、卷七第二叶至第三十七叶和卷八第二叶至第四十七叶。这两种版本的版式很相似，本文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六字，上图下文。尺寸也差不多，前者框高19.6厘米，宽12厘米，后者框高20厘米，宽11.9厘米。魏玛本序文半叶七行每行十七字，本文版心有“全像列国志传”字样，福克斯先生认为是余邵鱼所编的著名历史小说的普及本。在该目录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魏玛本卷四第三叶b面的书影。另外，沃尔芬彼特尔本卷二末叶用拉丁文写着“这本书也在德累斯顿的图书馆”，福克斯先生说德累斯顿现在已经没有这本书了(请参阅 Fleischer, Heinrich Lebrecht: Catalogus codicorum manuscriptorum orientalium Bibliothecae Regiae Dresdensis. Lipsiae 1831, p. 73)。

魏汉茂先生在〈列国志传 - 对德国如何接受一部中国长篇小说的看法〉里首先把沃尔芬彼特尔本和英国收藏的梅园刊本进行比较，推断这两个是同一版本，比如说卷二第二叶a面连木板的裂缝都一样。他还介绍梅园刊本的叶数，即序文有两叶，目录有五叶，卷一有四十二叶，卷二有六十六叶，卷三有六十一叶，卷四有六十八叶，卷五有六十九叶，卷六有七十叶，卷七有五十三叶，卷八有五十九叶。魏汉茂先生又指出沃尔芬彼特尔本和魏玛本也是同一版本，缺少每卷第一叶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之一。

之后，魏汉茂先生介绍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柏林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列国志传》，并刊登了两张书影，即封面和卷二第二十一叶b面。这本书封面题《按鉴演义列国志传》、“书林杨美生梓”，有陈继儒《叙列国传》和《新刻史纲总会列国志传》目录，卷一开头写着“《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卷之一，四知馆美生杨瑜校刊，羽生杨鸿编集”。一共有八卷，上图下文，本文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六字。

魏汉茂先生怀疑柏林本《列国志传》是余象斗的竞争对手在1609[6?]年左右翻刻的，也有可能是重新利用余象斗的旧版，指出它很像英国本和沃尔芬彼特尔本。由于图画好像有修改的地方，因此一方是另一方的翻刻本。魏汉茂先生又指出卷二第十三叶a面第八行有“国”字，是简化的。

关于柏林本，我要补充几句。该书框高20厘米，宽12厘米，版心刻书名《全像列国志传》，白口黑鱼尾，四周单边。序文有两叶，目录有五叶，卷一有四十二叶，卷二有六十六叶，卷三

有六十一叶，卷四有六十八叶，卷五有六十九叶，卷六有七十叶，卷七有五十三叶，卷八有五十九叶。有几叶印得有点儿模糊，好像木板很旧；有几叶印得非常清晰，好像是重新刻板：我怀疑柏林本是明刻本的后印本。

我没看到英国本和德国其他两本，但是根据书影，似乎比柏林本新。首先看卷四第三叶b面，柏林本每个字很粗，有的字模糊，空格和字头或字尾之间无界线，图画比较详细；魏玛本每个字又细又清晰，空格和字头或字尾之间有界线，图画稍微简单一些。至于卷一第一叶a面，柏林本除了上面说的几个特点以外，第二行第三行写着“四知馆美生杨瑜校刊，羽生杨鸿编集”，英国本却没有，好像不敢冒名。卷一第一叶a面还有一个差别，英国本每行第八字和第九字之间有裂缝，柏林本却没有裂缝。

三、明代福建杨氏刻书

为了弄清刻板时期，先弄清书肆活动期才好。虽然柳存仁先生根据余象斗重刊本的出版年代推断英国本是梅园1606年左右在苏州出版的，但是关于梅园有没有其他消息呢？大塚秀高先生怀疑梅园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连续出版《平山冷燕》和《玉娇梨》的书肆。根据大塚先生《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汲古书院1987年版），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梅园刊本《天花藏》，即《玉娇梨》和《平山冷燕》的合刻本，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刊的。

徐朔方先生也在《玉娇梨》的前言（《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里说：“《玉娇梨》与《平山冷燕》又有《合刻丛书》本，有〈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天花藏主人序署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康熙乙酉（四十四年，1705）岁春日，梅园重镌”。如果重视这个消息的话，梅园的活动时期应该说是清代中期。

四知馆仿佛活动得比梅园早。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记载，四知馆是杨金的名号，杨金字丽泉，号君临。当涂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福建副使。杨金刊本有《草堂诗余》四卷，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刊本。四知馆刊本有八种；据说有两种嘉靖本、五种万历本和一种天启本。

杨美生的名号也是四知馆，他或许是杨金的接班人。日本大谷大学收藏着“闽书林杨美生梓行”的《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据说也是万历刊本。至于杨羽生，只好暂时存疑。

这些消息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杨美生是出版《三国志传》的。那么它与余象斗刊本《三国志传》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探讨《列国志传》版本问题的时候，这个关系似乎可以作为参考。根据魏安（Andrew West）《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研究（『三国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说，余象斗刊本和杨美生刊本的版本系统不同。魏安先生把《三国演义》的版本分为四个系统，余象斗刊本（有两种，即“双峰堂刊本”和“评林本”）属于C支，杨美生刊本属于D支：中川先生的三大分类中，余象斗刊本（“余象斗本”和“志传评林本”）属于花关索系统二十卷繁本，杨美生刊本属于关索系统二十卷简本。就《三国演义》而言，余象斗刊本和杨美生刊本关系似乎不太密切。

第二，四知馆据说是杨金的名号，而且杨金字叫丽泉。刘修业女士早就注意到《列国志

传》载有不少丽泉诗。不仅如此，当年福建有个书肆叫清白堂，其主人名字也叫杨丽泉。《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卷一题“书林丽泉杨氏梓行”，卷二、卷三题“书林清白堂杨丽泉梓行”。版式相同的还有《新刻全像廿四尊得道罗汉传》，卷一题“书林清白堂梓”，卷二以下书肆名字似乎被删掉，卷六第二十四叶b面却有木记写着“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冬书林杨氏梓”。封面署云“万历乙巳年（三十三年，1605）夏书林聚奎斋梓”，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怀疑木版被转让。

清白堂主人还有杨闽斋。《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卷二题云“清白堂杨闽斋梓”，卷三、七~九、十四~十九署名皆有“清白堂”字样。该书《全像西游记序》末云：“时癸卯夏念（=廿）一日也”，孙楷第先生指出“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有木记写着“万历庚戌岁（三十八年，1610）孟秋月福建书林杨闽斋梓”。

杨氏清白堂出版的通俗小说还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的《新刻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和万历十六年（1588）刊的《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可是，这两本书的来历都相当复杂。

《新刻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卷一开头写着“书林清白堂刊行”，书末附载的《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开头也署“书林杨氏清白堂刊行”，后者第八十八叶b面还有木记云“嘉靖壬子年秋清白堂新梓行”。可是卷八第五十一叶b面却有另一个木记写着“嘉靖壬子孟冬杨氏清江堂刊”。石昌渝先生在《朝鲜古铜活字本〈精忠录〉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东北アジア研究》第2号，1998年）里推断这本书是清白堂用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刊刻的旧版重印的。按该书有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说这篇小说是应“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之请而编辑的，《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七辑〈前言〉索性将此书称为“清江堂杨涌泉刊本”，还指出杨氏清江堂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版了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由西汉部分六卷和东汉部分六卷而组成的。东汉部分第六卷第四十二叶b面有木记云“清白堂杨氏梓行”。可是东汉部分第一卷开头写着“爱日堂继葵刘世忠梓行”，西汉部分卷一开头写着“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行”，其他各卷开头所署均指余氏，另有《叙西汉志传首》、《题东汉志传序》，最后都写着“万历十六年秋月，书林余氏克勤斋梓”。《古本小说丛刊》第五辑〈前言〉推断“大约余氏此书板片后为爱日堂或清白堂所得并重印”。

这方面大塚秀高先生颇有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论文以外，他还有《从嘉靖定本到万历新本—以熊大木和英烈、忠义为端绪—（嘉靖新本から万暦新本へ—熊大木と英烈・忠義を端緒とし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4册，1994年）等专论。大塚先生指出嘉靖后半熊大木编纂的这些小说都是由杨氏清江堂、清白堂刊行，而万历年间在南京附上王少淮写像相继刊行，在福建由余氏三台馆以上图下文形式出版，在这三次出版中分则形式渐次变化，以至诞生了新的分回形式。

这种看法有些地方恐怕值得商榷。例如据说《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是余氏出版时才采用上图下文形式的。不过该书却有清白堂的木记，小松谦先生在《中国历史小说研究》中说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另外，正德六年（1511）“清江书堂杨氏重校刊行”的《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虽然不是嘉靖年间出版的通俗历史小说，但是也采用上图下文形式，好像起到先驱的作用。

话虽如此，杨氏书肆万历年间以前就很活跃，那么四知馆杨美生刊本《列国志传》的内容

即使接近于原本也并不意外。下面我想比较一下柏林本《列国志传》以及有关版本的部分内容，初步探讨柏林本的特点。

四、版本之间的关系

孙楷第先生说万历本《列国志传》有三种，余象斗重刊本（以下叫“评林本”）。该书版心题为《全像列国评林》）最早，其次是没有朱篁序的陈继儒重校本（以下叫“龚本”）。半叶十行。该书封面署“閩門龔韶山梓”，卷一、卷二署“姑苏龔绍山梓行”，卷四却署“古吳朱篁參閱”），最晚的是有朱篁序的陈继儒重校本（以下叫“朱本”）。半叶十一行）。评林本有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序文，龚本、朱本有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序文。龚本、朱本都有〈列国源流总论〉，朱本末行写着“邵鱼謹志”，孙先生认为是补书。

大塚秀高先生在〈讲史章回小说的出版与改变—以《列国志》为中心〉里指出，朱本才是最接近于原本（请参阅本文第一节），小松谦先生也在《中国历史小说研究》里赞同他的看法。大塚先生还提醒我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搜集的朱本卷四以后其实是龚本。据〈三续研究前后〉，朱本卷十二卷尾署“万历岁次乙卯孟冬日姑苏龔绍山梓行，平江顾述父书”字样。

大塚先生指出，余象斗把《列国志传》的部分内容删掉了。他举了四个例子。

(1) 评林本卷八第六十叶b面（〈田单兴兵复聊城〉）末行说：“[燕王]又谓群臣曰，此贼谋反，汝等何计可擒。群臣皆莫答”，第六十一叶a面头行接着说：“却说赵王设朝”云云。据大塚先生说，余象斗把朱本卷十二第二十五叶a面到第二十九叶a面的内容（即鲁仲连上书的故事）都删掉了。这个地方不会是朱本加上的，因为其中包括丽泉诗。朱本“[燕王]又谓群臣曰，此贼谋反，汝等何计可擒”之后接着说：“此人。群臣曰，我王休忧”云云。龚本卷十二第三十五叶a面也有同一样字，接着写的是鲁仲连上书，第三十八叶a面有丽泉诗，然后题为〈庄襄王发兵征赵〉，到第三十九叶b面才说：“却说赵王设殿”云云。是“设殿”，不是“设朝”。有趣的是评林本目录有〈庄襄王发兵征赵〉，本文却没有。

柏林本卷八第四十叶b面写着“[燕王]又谓群臣曰，此贼谋反，汝等何计可擒此人。群臣曰，我王休忧”云云。接着描写鲁仲连故事，却没有丽泉诗，第四十二叶b面头行题为〈庄襄王发兵征赵〉，末二行就说：“却说赵王设殿”云云。柏林本比较接近于朱本、龚本，但是〈庄襄王发兵征赵〉从“却说秦王感吕不韦救己之功”谈起，比龚本少了几句。

(2) 评林本卷三第二十四叶b面（〈管夷吾骂死斗伯比〉）有七言律诗，末句为“气死荆蛮马下埋”，接着说：“齐兵进屯於陉山，楚之残兵走入报楚，楚王闻伯比气死”云云。朱本接着七律却说：“管仲以剑麾左右而进，宾须无抢上，斩比於阵前。斗章看见，拍马来攻胥无。二将斗至二十余合。高奚横枪夹攻，斗章力不能抵，败马走回。高奚赶上，活捉斗章。大兵进屯於陉山，不知胜负如何”，然后题着〈管仲召陵服强楚〉，之后才说：“齐兵进屯於陉山，楚之残兵走入报楚，楚王闻伯比气死”（卷三第六十八叶b面）。其实评林本目录有〈管仲召陵服强楚〉，本文却没有这个题目。龚本卷三第七十四叶b面以下完全与朱本相同，至于“齐兵进屯於陉山”下面有小注云：“楚之地名”也一样。评林本没有这个小注。

柏林本卷三第十六叶b面题着〈管仲召陵服强楚〉，前后大致与朱本相同，七律之后写着：“管仲以剑麾左右而进，宾胥无抢上”云云。按历史书，写“宾须无”才好。不过《列国

志传》里写“宾胥无”的地方不少，因此不一定是柏林本搞错了。另外，“齐兵进屯於陉山”下面没有小注。

(3) 评林本卷一末叶，即第六十四叶b面（〈太公灭纣兴周〉）有一首诗，并不押韵：“成汤纪纲德声扬，放桀南巢正大纲。六百乾坤传及纣，谁知付与武周王。苦陷忠良恶不悛，惟耽妲己信谗言。黎民不道君王死，反向天街鼓舞欢”。朱本第四句和第五句之间却有：“又东屏先生有诗云”字样，原来是两首诗，再者第一句为“成汤祝网”云云（第七十六叶a面）。龚本卷一第八十三叶b面完全跟朱本一样。

柏林本卷一第四十二叶a面虽然印得有点模糊，基本上跟评林本一样，只是把最后一句写成“及向天街”云云。更重要的是柏林本卷一到此为止。其实评林本、朱本和龚本下面还有一首〈五字诗〉才结束。

(4) 评林本卷二第七十五叶a面（〈郑祭仲杀婿逐君〉）说了“遂命家人捉纠斩之”以后有一首七绝，从“由来男子本刚肠”开始。朱本卷三第十一叶b面接着“遂命家人捉而斩之”还有一句说：“后人有诗为证云”。龚本卷三第十二叶b面跟朱本相同，这两本都把第一句写成：“由来男子本刚强”。

柏林本卷二第五十叶b面完全和评林本相同。

从以上四个例子来看，柏林本好像没有朱本那么接近于原本，有些地方删掉得比评林本还多。但是柏林本却保存了一些被评林本删掉的地方，好像不是根据评林本刻板的。

大塚先生又指出，评林本有九首被称为余象斗（即余仰止）作的诗，但朱本把其中三首看成别人的作品，其他六首根本没收录，显然朱本是根据余象斗改变以前的本子刻的板。

(1) 评林本卷一第三十八叶a面（〈子牙收服崇侯虎〉）有一首七绝：“渭水溪头一钓翁，谋谋西伯扇仁风”云云，前面说：“后仰止有诗一绝云”。朱本卷一第四十五叶a面也有这首七绝，不过第二句头两字颠倒，平仄协调。前面只说：“后人有诗一绝云”。龚本卷一第四十九叶b面与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一第二十五叶a面虽然描写〈子牙收服崇侯虎〉的故事，竟没有这首七绝。

(2) 评林本卷一第五十一叶b面（〈子牙收服洛阳城〉）有一首七绝：“陆地行舟倚势强，横行西阵莫能当”云云，前面说：“后余仰止有诗叹曰”。朱本卷一第六十一叶a面也有这首七绝，但第二句末字作“强”，第一句和第二句韵字重复。前面只说：“后人有诗为证”。龚本卷一第六十七叶a面把七绝第二句写成：“横行西阵莫能当”，“当”字显然是后人改写。这首诗前面跟朱本一样说：“后人有诗为证”。

柏林本卷一第三十五叶b面也有这首七绝，第二句末字是“当”，跟评林本一样，前面却说：“后有诗叹曰”。另外，七绝第三句为：“子牙一试洪炉计”，评林本、朱本和龚本该句末字都作“火”。

(3) 评林本卷二第九十六叶a面（〈楚文王仗威虏息妫〉）有一首七绝：“息妫肯侍楚王前，骨肉交游止不言。既识二夫非烈女，何不早死绝重缘”，前面说：“后仰止余先生观至此有诗断曰”。朱本卷三第三十七叶a面这首诗前面却说：“潜渊居士读史诗云”，诗中个别字眼也不同：“息妫肯事楚王前，百媚千娇止不言。既适二夫非烈女，何如早死后花园”。龚本卷三第四十叶b面和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二第六十五叶a面也有七绝，跟评林本相同，不过前面只说：“有诗曰”。

(4) 评林本卷三第二十九叶b面（〈鲁村妇秉义全社稷〉）有一首七绝：“鲁国君臣乱似

尘”云云，后面还说：“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又有诗为证：城郊顷刻丧似尘”云云。朱本卷三第七十五叶a面却没有余象斗诗。龚本卷三第八十一叶b面与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三第二十叶a面也没有余象斗这首诗。

(5) 评林本卷三第五十九叶b面(〈十英杰辅重耳逃难〉)有三首诗，第二首是“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处又有诗为证”的七绝：“申生纯孝世同跨，观此令人泪叹嗟”云云。朱本据大塚先生说没有余象斗这首诗。龚本卷四第三十六叶a面也没有余象斗诗。

柏林本卷三第四十叶b面有这首七绝，只是第二句第三字作“人”，前面仅说：“后人有诗为证”。

(6) 评林本卷五第六十八叶b面(〈楚平王信谗灭伍氏〉)有首七绝：“惨惨悲风晦日皇”云云，后面还有“后仰止余先生观此有感”的七绝，即“伍奢父子丧幽冥”云云。朱本据大塚先生说没有余象斗这首诗。龚本卷七第四十九叶a面也没有这首诗。

柏林本卷五第四十六叶b面也没有余象斗诗。

(7) 评林本卷五第八十三叶b面(〈浣纱女抱石投江〉)有首七律：“濑水江边女丈夫”云云，前面还有一首七绝：“偶以相逢失问途，情怀比翼两俱无。何须草草捐身命，不念双亲体发肤”，据说是“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此留有诗断云”的。朱本据大塚先生说没有余象斗这首诗。龚本卷七第六十八叶b面也没有。

柏林本卷五第五十六叶b面却有类似的七绝：“假若相逢失问途，情怀比翼两俱无。河渡寸心丧身命，不念双亲体发肤”，但前面说：“后史臣有诗云”。从格律上看，柏林本七绝第三句没有评林本那么好。

(8) 评林本卷五末叶，即第一百零三叶a面(〈要离行诈刺庆忌〉)最后说：“后仰止余先生观到，本欲评要离之过处，要离目(=自)诉其过而死，不足再评矣”，下面没有诗，但是大塚先生把这个地方包括在内，说评林本有九首余象斗诗。他说朱本没有这些句子。龚本卷八第十五叶b面也没有这么说。

柏林本卷五第六十九叶b面也没有这些句子，最后说：“不知此人是谁，看后何如”。按龚本以“不知此人是谁”为止。

(9) 评林本卷六第十九叶a面(〈楚昭王奔郧入随〉)有首七绝：“吴国君臣入楚时”云云，下面还说：“后仰止余先生观到又有诗为证：吴国君臣，惟此五人。孙武胥辈，俱皆兽禽”。据大塚先生说朱本没有余象斗这首诗。龚本卷八第三十九叶a面也没有。

柏林本卷五第十二叶b面也没有余象斗诗。

从以上九个例子来看，柏林本虽没有余象斗诗，但载着一些朱本、龚本没有的无名氏诗。

大塚先生又指出，评林本有六首余邵鱼诗，这六首诗在朱本里都是别人作的。他推断余邵鱼这些诗是余象斗伪造的。

(1) 评林本卷一第十八叶a面(〈纣立酒池肉林〉)有首七律：“先王制律为民忧，商纣奢淫祸自求”云云，前面说：“后邵鱼余先生有八句诗云”。朱本卷一第二十叶b面也有这首七律，但是第二句为“商纣淫奢”云云，前面仅说：“后人有八句云”。龚本卷一第二十一叶a面与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一第十二叶a面基本上和评林本一样，但余邵鱼诗第八句第二字作“来”。

(2) 评林本卷一第十九叶b面(〈西伯侯脱囚归岐州〉)有首五律：“孤身出西岐，万里探亲灾”云云，前面说：“后邵鱼余先生诗哀曰”。朱本卷一第二十二叶b面也有这首诗，不

过第一句遵守格律作“孤身西出岐”，前面只说：“后人有诗哀曰”。龚本卷一第二十四叶b面跟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一第十三叶a面完全和评林本一样，有余邵鱼诗。

(3) 评林本卷一第三十六叶a面（〈西伯侯再访子牙〉）接着苏轼“闻道磻溪石”五绝又说：“皇明余邵鱼又有一绝独题磻溪曰：夜入磻溪如入峡”云云。大塚先生指出，这首诗其实是苏轼〈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七律的前四句。朱本卷一第四十二叶b面虽然也有被腰斩的这首诗，前面却说：“又有一律独题磻溪云”。龚本卷一第四十六叶b面与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一第二十三叶b面根本没有“夜入磻溪如入峡”这首诗。不仅如此，柏林本苏轼“闻道磻溪石”五绝前面只有唐人梁肃七绝一首：“一柱兴周刀有余”云云。其实，其他万历本三种竟有四首诗；胡曾诗、东屏诗、史臣诗和梁肃诗。这些本子里梁肃七绝第一句为“一顾成周力有余”。按此诗乃陈陶〈闲居杂兴〉（《唐诗纪事》卷六十），起句亦为“一顾成周力有余”。

(4) 评林本卷一第五十八叶b面（〈太公遗计收五将〉）有首七绝：“姜尚神机绝世奇”云云，前面说：“当时余邵鱼有诗为证云”。朱本卷一第六十八叶b面也有这首诗，前面只说：“当时有诗为证云”。龚本卷一第七十五叶b面与朱本相同。

柏林本卷一第三十八叶a面基本上和朱本、龚本一样，只说“当时有诗为证”，没有“余邵鱼”“云”四个字。

(5) 评林本卷三第七十一叶a面（〈公孙枝独战六将〉）有“秦晋交锋大象山”七律，第六句是“折冲晋阵虎吼山”，第八句是“怎脱重围奏凯还”，前面说：“后邵鱼先生有诗为证”。据大塚先生说，朱本没有说这是余邵鱼的诗。龚本卷四第五十一叶b面说：“后人有诗云”，然后有这首诗，第六句是“折冲晋阵虎归山”，第八句是“争脱重围奏凯还”。

柏林本卷三第四十八叶b面也有这首诗，前面说：“后人有诗为证”，第六、八句跟龚本一样。

(6) 评林本卷三末叶，即第九十一叶a面（〈宋楚泓水大战〉）接着潜渊诗说：“邵鱼余先生又一绝以叹子鱼有先见之贤云：战国君臣相弑诛，谦而让位有谁知”云云。据大塚先生说，朱本没有说这是余邵鱼的诗。龚本卷四第七十七叶b面也有这首七绝，前面只说：“又一绝以叹子鱼有先见之智云”。

柏林本卷三第六十一叶b面也有这首诗，第二句第二字有点儿模糊，但不是“而”字，好像是“虚”字。前面仅说：“又叹子鱼有先见之贤云”。

从以上六个例子来看，柏林本有两首余邵鱼诗，与朱本、龚本不同，但没有评林本那么多。上面介绍过，柏林本保存了一些被评林本删掉的地方，因此它不一定是根据评林本刻板的。柏林本收录两首余邵鱼诗是不是跟它的蓝本有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节再谈自己的看法。

大塚先生还指出，朱本和龚本的内容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龚本是根据朱本刻板的，铁证是龚本卷四开头刻着“古吴朱篁参阅”字样。还有龚本插图比朱本简单，例如卷十一插图第一叶b面〈六龙会苏秦挂印〉构图类似，但龚本少了一匹马。另外龚本为了节约篇幅，换行没有朱本那么多。例如朱本卷二第二十三叶b面（〈楚子胶舟溺昭王〉）说：“唐人胡曾先生有诗为证”，下一行有陈继儒批：“批：舟中人直敌国哉”，然后又换了行才有“汉江一带碧

流长”七绝。龚本卷二第二十五叶b面却把“唐人胡曾先生有诗为证”、“批：舟中人直敌国哉”两种句子塞进一行里，下一行直接就是七绝。

换行的还有一个例子：朱本卷三第七十二叶a面（〈管仲召陵服强楚〉）先说：“胡曾先生有诗为证云：小白匡周入楚郊”云云，然后说：“又宋人有诗云：齐侯耀武入荆襄”云云。龚本卷三第七十八叶b面却先有宋人诗，再有胡曾诗。胡曾是唐人，龚本次序颠倒，不过这么一来能节省篇幅。因为朱本“胡曾先生有诗为证云”上一行末有六个空格，这里能插进“宋人有诗云”五个字。

柏林本卷三第十八叶b面先有胡曾诗，接着有宋人诗，这跟朱本一样。

上面我们看了一些柏林本的特点。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看待这个本子的性质好呢？

五、小结

柏林本虽然由杨氏书肆出版，但还是朱本更接近于原本。柏林本有的地方删节比评林本更厉害，不过也保存了一些评林本删除的句子。因此柏林本不会是根据评林本删节的。

柏林本没有余象斗诗，却有两首余邵鱼诗，前面都说：“邵鱼余先生”什么的。余邵鱼恐怕不会自己这么叫，这是别人尊敬他的叫法。这个别人是不是四知馆杨美生呢？恐怕也不是。据柏林本的内容来看，杨美生好像没有积极地改变句子。他很可能有另外一种蓝本，由于篇幅的关系删去了部分内容，不过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沿袭旧文而刻的。

我们知道余象斗出版的一些小说有两种版本。例如《三国演义》有两种余象斗刊本（请参阅本文第三节），《南北宋志传》有日本弘前市立图书馆收藏的“熊大目（=木）编集”三台馆余象斗刊本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陈继儒编次”三台馆刊本（没写编辑的名字）。我估计《水浒传》也除了有名的余象斗评林本以外还会有另一种余象斗刊本，这是把几种简本《水浒》的内容比较了以后做的推论，请参阅氏冈真士〈《水浒传》与余象斗（『水浒伝』と余象斗）〉（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论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第38号，2004年）。

如果柏林本是根据余象斗出版的另一种《列国志传》刻板的话，我们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另一种《列国志传》比评林本接近于原本，余象斗虽然为了宣扬余邵鱼而伪造“邵鱼余先生”的诗，但是还没敢伪造或插近自己的诗。后来杨美生根据这个另一种余象斗本《列国志传》而重新出版了一种简本《列国志传》，即柏林本。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我打算今后继续对此进行研究，尚希各位不吝指教。

（本文是得到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课题番号16320045，研究代表上野隆三）而进行的研究成果之一。）